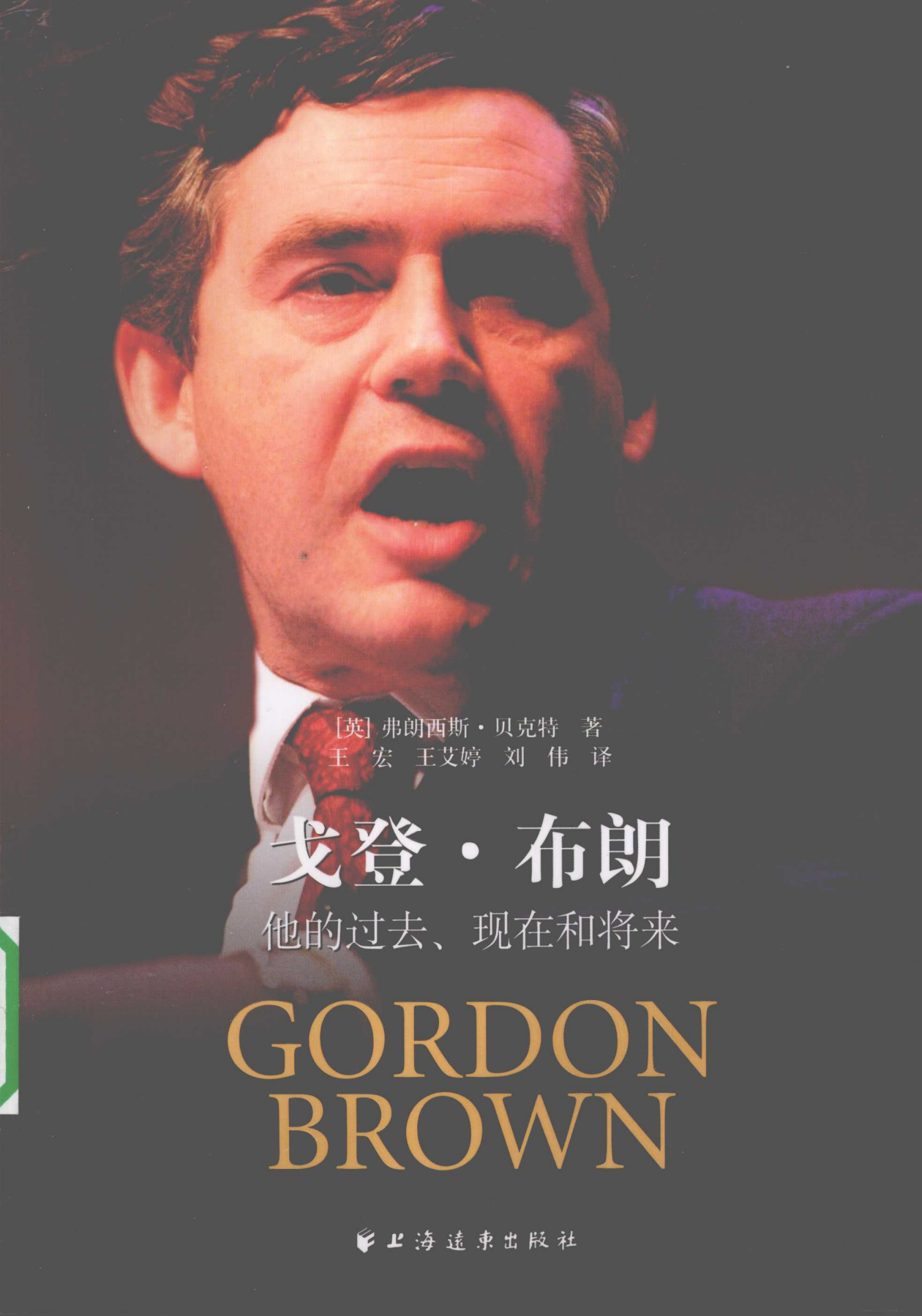


A close-up portrait of Gordon Brown,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with his mouth open as if speaking. He is wearing a dark suit, a white shirt, and a red patterned tie.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

[英] 弗朗西斯·贝克特 著
王 宏 王艾婷 刘 伟 译

戈登·布朗

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GORDON BROWN

 上海远东出版社

[英] 弗朗西斯·贝克特 著
王 宏 王艾婷 刘 伟 译

戈登·布朗

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GORDON
BROWN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戈登·布朗：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英)贝克特著；王宏，王艾婷，刘伟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

ISBN 978-7-5476-0031-3

I. 戈… II. ①贝…②王…③王…④刘… III. 布朗，G—生平事迹 IV. K835.6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5105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GORDON BROWN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pyright(c) 2007 by Haus Publishing Limited, London

本书由英国 HAUS PUBLISHING LIMITED 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图字：09-2008-459 号

责任编辑：戴 铮
封面设计：李 廉
版式设计：李如琬
责任制作：李 昕

戈登·布朗 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著者：[英]弗朗西斯·贝克特
译者：王 宏 王艾婷 刘 伟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装订：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版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字数：156 千字
印张：12.25 插页 3
印数：1—5100

ISBN 978-7-5476-0031-3/K·110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55

序 言

在英国，人们总是把“不苟言笑”一词与“苏格兰人”联系在一起，也许这就是公众对戈登·布朗的看法与事实大相径庭的原因吧。私下里的布朗幽默风趣、学识渊博、风度翩翩；嗓音轻柔悦耳，极富磁性，笑起来那声音如泉水汨汨作响，甚是欢快。

我于2007年4月底完成此书，前后只用了三个月时间。本书即将杀青之际，布朗邀我去唐宁街11号共进早餐。他想和我聊天，而不是接受采访。聊天和采访的区别在于：我在书中不能引用他所说的话，只能使之贯穿于我的写作之中。我的确是这样做的。

见面的地点是一间小会客厅。我们坐在咖啡桌旁带有扶手的椅子上，桌上摆放着两份切好的水果、羊角面包和咖啡。从这里能俯瞰相邻的唐宁街10号花园。映入眼帘的有：伏倒在草坪上的紫藤、夏日里供首相决策的庭院，以及年幼的利奥·布莱尔^①的那张圆形蹦床，床的四周围有围栏以防意外。唐宁街10号花园比我要想象的要小一些，却很有家庭氛围。我在伦敦郊外寓所二楼的书房能俯瞰邻居家的砖砌烤炉，我们经常在夏天围着这烤炉吃烤肉串、喝果酒。我与布朗见面时自然产生了一种类似我现在书房写作时的同样感受。

布朗的言谈举止增添了这种惬意的郊外气氛。得知距上午9时内阁会议开会的时间尚有整整45分钟，布朗显得十分轻松，只是担心我吃得太少。（我确实把记笔记放在了优先位置。）

我感谢布朗在百忙之中抽空与我见面。由于时间有限，我们

^① 译注：利奥·布莱尔为布莱尔夫妇的小儿子。



的谈话只能涉及一些话题的表面。本书旨在成为一本布朗的传记,并对他的过去进行评述,揭示即将成为布朗首相的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本书的素材大多取自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和其他访谈录。

从一开始,本书完成的期限犹如一列法国高速列车迎面向我驶来。我没有时间去采访我想采访的每一个人,或去寻找、安慰那些与我交谈有所顾忌的人士。但我要对所有允许我采访的人士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合作,本书的质量会大打折扣。

财政部经济次长、自1984年以来一直是布朗密友兼顾问的埃德·鲍尔斯也以聊天的形式和我进行了有益的交谈。布朗在爱丁堡大学的老朋友、布朗智囊团史密斯研究所的主任维尔夫·史蒂文森给了我许多明智的忠告和有用的信息。尼尔·金诺克与我进行了出人意料的、深入坦诚的交谈。我还与其他政治人物进行了有益和有趣的谈话,他们是:罗伊·哈特斯利、下议院议员尼克·布朗、约翰·埃德蒙兹、下议院议员戴维·蔡特以及一些不愿接受致谢的人士,我对他们怀有同样的感激之情。

与托尼·布莱尔关系密切的政治家都不太愿意向我提供帮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拒绝了我与之约谈的请求。当前,工党政治有帮派化的倾向。不管愿意与否,所有的政治评论家都会被贴上“布朗派”或者“布莱尔帮”的标签。这里显然有一种酷似撒切尔夫人的冷酷逻辑:政治上的操刀弄笔者非敌即友。

也许“布莱尔帮”把我看成了“布朗派”的人。然而,正如本书所表明和布朗所意识到的那样,我对布朗持有相当多的批评意见。但给作者贴上标签似乎是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布朗派”的鼎力相助以及“布莱尔帮”的百般阻挠也许能部分(尽管不是全部)解释我为什么更为支持布朗而不是布莱尔。

两位曾经为布朗撰写传记的威廉·基根和保罗·劳特利奇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们的广博知识和精辟见解。两位从事新闻业的老朋

友——《卫报》驻威斯敏斯特记者戴维·亨克以及《新政治家》的政治编辑马丁·布莱特——也给予我同样的帮助，我曾与前者合写过一本有关托尼·布莱尔的书。给予我有益帮助的人士还有：记者奈杰尔·琼斯、菲奥娜·米勒和哈里·康罗伊；科林·霍姆斯教授以及布朗的校友利兹·麦克维卡。我还受益于撰写本书之前所读过的有关回忆录和早些时候与撰写《财政大臣布朗的第一年》一书的作者之一尼克·科昌的谈话记录，除此之外我还受益于约翰·卡尔、鲍勃·伍斯特、布莱恩·古尔德、约翰·蒙克斯等人的谈话。

当然，最使我受益匪浅的还是与布朗共进早餐。除了发现他极为友善外——对于未曾与他谋面的大多数人来说，我的这番言辞定会让他们大吃一惊，而对于那些熟知他的少数人来说，这算不得什么新发现——布朗还给我留下了两点特别深刻的印象。

首先，布朗是一位历史学家。这不仅仅指他拥有历史学博士的头衔，尽管这是事实。我想说，布朗对过去的历史有一种特别的感悟。这不是因为他曾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仍然是。布朗洞悉现实与历史延续之理。他不会以我们今天对现实的了解来判断人们过去的行为。换言之，他不会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历史。正如没有经历过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能对之明察秋毫，布朗对这段历史也了如指掌。他和我可以花上整个上午的时间评论马克斯頓、麦克唐纳、丘吉尔和艾德礼。自从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卸任后当选的首相都没有历史感。出于种种原因，布朗一心想成为像麦克米伦一样的首相。他能否做到，我们将拭目以待。

其次，由于布朗读大学时年仅 16 岁，他受益于上世纪 60 年代早期（而不是晚期）实行的公立学校政策。当时正值 1968 年的那一代激进冒牌革命者席卷欧洲的前夜。如同尼尔·金诺克一样，布朗也是时代的产物。当年的学生激进分子强烈意识到，尽管身无半文，他们却有幸成为进入大学的第一代年轻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非常严肃认真，身着粗花呢上衣，支持工党。尽管仅比托尼·布莱尔年长



两岁,布朗实际上属于比布莱尔早一代的人。布莱尔是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私立学校的产物,看上去更为革命,但是缺乏有坚实基础的激进精神。我认为,这就是两人之间难以弥合的差距,尽管他们多年来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序 言

1

第一章 牧师之子	2
第二章 犹豫不决的学生政治家	14
第三章 苏格兰工党角逐政坛	26
第四章 在媒体与政治之间	38
第五章 议会新星	52
第六章 下一任首相?	60
第七章 是否存在交易?	72
第八章 新财政大臣	82
第九章 布朗和布朗派	92
第十章 谨小慎微	102
第十一章 布莱尔与布朗之秀	114
第十二章 布莱尔与布朗政治秀的终结	126
第十三章 寻找布朗以外的首相继承人	134
第十四章 布朗过去做过什么?	148
第十五章 假设戈登可能所做之事	160
第十六章 戈登将会怎么做?	168

第一章



牧师之子

约翰·埃比尼泽·布朗牧师家在离格拉斯哥市区不远的戈万区。1951年2月20日这天，他若要出门可不容易。当时英国正为一场铁路大罢工所困扰，三大工会与英国铁路公司的谈判也陷入争吵不休的境地。早上报纸还称尚有取得突破的希望，然而谈判却在当日就破裂了。所幸的是，布朗牧师这天哪儿也不去，因为当天上午8:45，他妻子伊丽莎白又给他添了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为詹姆斯·戈登·布朗。身为人父的布朗牧师自然知道自己肩上的职责所在。

就在这个足足有八九磅重的健康宝宝在离家不远的私人产科医院出生之时，铁路争端的劳资双方将其纠纷诉诸劳工大臣安奈林·贝文。

也是在这天早晨，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和他的副手赫伯特·莫里森花了一个小时参观皇家音乐厅的选址所在地——伦敦泰晤士河南岸。建造皇家音乐厅是莫里森的主意，他告诉记者：“我们将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公众开放皇家音乐厅，请不要相信与之不符的传言。”莫里森没有食言。小布朗出生三个月后，皇家音乐

厅按时向公众开放。

铁路工人的罢工在小布朗出生的第四天就偃旗息鼓了。《每日邮报》对此的报道既欣喜有加又无比愤怒，因为贝文几乎答应了铁路工人所有的要求。

戈登·布朗了解自己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将秉承艾德礼首相和麦克米伦首相的传统——他们同为历史系学生，都能以史为鉴，相信对历史的了解有助于政治家做出决断。托尼·布莱尔和撒切尔夫人则代表了另外一种传统。他们对历史知识知之甚少，有时甚至认为历史是务实政治家的负担，尽管布莱尔说过，希望自己在大学学的是历史而非法律。

熟谙自己历史的戈登·布朗知道，同样的问题会以不同的方式重现，留待下一代来解决。布朗长大成人后，大部分时间都被工会与罢工这样的事情所缠绕，他将成为一位谨慎行事的英国政要。赫伯特·莫里森的孙子彼得·曼德尔森则会支持皇家音乐厅东部几英里之外千年穹顶的建造。与布朗相比，他取得的业绩将大为逊色。

在布朗出生当天，《曼彻斯特卫报》中的一封信隐约展现了一个为布朗日后所熟知的政治世界：

“感谢您对J·P·W·马拉柳书信的评论。”议会走廊记者组织主席盖伊·伊登在信中写道。马拉柳曾对一篇由《曼彻斯特卫报》派驻在议会的记者所写的一篇文章表示不满。伊登对此大为光火：“我们这里有一条议会走廊记者多年来一直遵守的规则，就是在议会大厦里听到的任何消息不得公开发表。马拉柳先生口口声声说自己曾是议会走廊记者，竟然将这里多年来奉行的规则忘得一干二净，这着实让人觉得有些奇怪。”《曼彻斯特卫报》的走廊记者“能够用让人无法指责的方法获取议会议员私下谈话纪要的准确信息”，这些无法追溯信息源头的谈话纪要将成为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彼此攻击的首选方法。

当时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工党政府的任期即将结束。艾德礼工



党政府当选的时间是 1945 年，然而，工党所制定的国内政策一直延续到 1979 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才得以终结。这一纪录成为此后所有工党政府（包括布朗曾担任要职的工党政府）的标尺。

这一届工党政府曾发起对“五大顽症”的首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击。这五大顽症便是二战时期贝弗里奇报告中所指出的贫困、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惰。在戈登·布朗出生前三年的 1948 年 7 月 5 日，国民保险法、工业伤害保险法、家庭补助法与国民医疗保健法等四项法律正式生效。这些法律都是基于一条新的原则。艾德礼对此解释说：“全体国民必须联手应对单个公民无法独自应对的突发事件……新制定的这些法律条款覆盖范围广，适用于每个公民，使所有的英国家庭成员有了安全保障。”二战时，丘吉尔曾期望，英国公民从“摇篮到坟墓”一生都享受国家照顾。艾德礼说，国民医疗保健法靠整合国家资源，统筹医疗费用，为全体公民提供全面的医疗卫生保障。上世纪 80 年代，英国全国公务员联合会制作了一批印有“生于国民医疗保健时代”标语的 T 恤，当时的中年男女身着此衫，甚是骄傲。布朗是属于第一代有资格穿这种 T 恤的人，然而，T 恤从来不是布朗的衣着风格。

当时，英国经济已被战争拖垮，代价惨重。许多人质疑英国当时根本无力支付如此巨额的账单，他们认为，不管这些主张多么有价值，一切皆要等到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之时才能付诸实现。国家经得起如此巨额的财政支出吗？明智审慎的财政大臣能允许这样的支出吗？1946 年，艾德礼给了下议院如下答复：

“有人问，我们可以付得起吗？如果我们说‘不’，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国国民生产的商品与提供的服务无论在何时都无法满足全体国民的需求，无法满足国民保险法第二个附件中规定的居民最基本的生活标准，无论其健康与否，无论年轻还是老迈。我无法相信，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发展会如此缓慢，我们的工作热忱会如此羸弱。我也无法相信我们要向全世界坦言我们的人民注定要饱受贫困

之苦。”

艾德礼对此烂熟于心，可他却只字未提。他深知，普世的福利与低位的税率不可兼得。1945 年大选时，选民也知道这一点，当他们投票给工党时，也是异常谨慎。1997 年，英国选民选举新工党政府上台执政时，他们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到了 1951 年，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政府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回顾 1945 年的大选，工党可谓众望所归，顺利成为议会多数党。然而到了 1950 年，工党在议会仅有 5 个席位的优势。在布朗刚刚 8 个月大的那年 10 月，艾德礼不得不重新举行大选。虽然最后他获得的票数比保守党多，但是保守党还是在下院比工党多出 17 个席位，从而获得议会绝对多数。这也意味着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统治的终结。

上世纪 50 年代，人们还护卫传统，恪守道德。小布朗在此期间成长，定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今，那段岁月常被视为英国社会最后的荣耀。此后，性自由和离经叛道接踵而至，肆意泛滥。比布朗小两岁的布莱尔有时让人感觉他是持有如此看法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上世纪 30 年代的自由主义氛围早在战后阴霾的岁月中一点点消失殆尽。50 年代的英国比战前更保守，更让人感到压抑。

当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禁书。流产、同性恋或者任何未经负责王室事务的宫务大臣许可便贸然上演伦敦西区的戏剧都是违法的。比布朗年轻的人都不熟悉这样的时代。然而，布朗对此却毫不陌生。

当时的年轻人对长者、权威和上级必须绝对服从。约翰·奥斯特本的剧本《卖艺者》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 1956 年的故事。一位年轻人即将开赴埃及苏伊士运河前线打仗。临行前，他说道：“局势没那么糟糕，即使很糟糕，我们也无能为力。”年轻人改变世界的勇气、反叛与质疑的精神似乎全部被战争的苦难给磨平了。战后的几年里社会惨淡萧条，民不聊生，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才有所起色。



这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世界。男人永远都留着一种马桶盖式的发型,其他发型都会被认为没有男子汉气概。一套灰色西装、一条挽角肥腿裤、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往往是中产阶级男性工作日的固定穿戴。

布朗从小在长老会牧师家中长大,家里肃穆森严的氛围使得小布朗的童年并没有多少欢声笑语。但是,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仍然使他感到温暖而惬意。他知道,父母深爱着他。多年后,布朗在回想往事时说:“作为牧师之子,我从小就深知文明社会应担负的社会责任。一个团结互助的强大社会是身处其中的个体福祉的基石。”这样的家庭氛围让小布朗强烈意识到惩恶扬善的上帝的存在。正如布朗牧师在布道时所讲的那样:人必须为自己一生中的所作所为负责。

布朗3岁时,全家搬到了苏格兰的柯科迪市。布朗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后来,他就读当地的西柯科迪小学,开始了严谨的求学之路。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学校教育枯燥乏味,对那些来自家庭一贯重视教育的聪明孩子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当时的学生每天要花很长时间分析句法,记住地名。小布朗也是在这样死记硬背式的教育环境中逐渐长大的。他在一幢建于1875年、房屋已经有些倾斜的破旧校舍里上课。在这里,他用铅笔在石板上写字,然后用一条肮脏无比的湿破布擦去上面的字迹。

柯科迪市位于福斯湾北部,是法夫郡最大的城市,19世纪因纺织、漆布和煤矿工业的发展而初具规模。在布朗之前,该市最著名的人物是政治经济学家、《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1723—1790)。他是自由主义经济孕育的果实,也是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石。位于伦敦的亚当·斯密研究所仍然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右翼智囊团,而学历史出身的布朗一直想把亚当·斯密从右翼阵地中拯救出来。在他看来,是后人硬把右翼的标签贴在了亚当·斯密身上。

正如布朗的老友维尔夫·史蒂文森所言:“在布朗童年之时,柯

科迪还是一片穷乡僻壤。唯有在教堂里，人们才会获得机会，得到希望。他看到城里的穷人来教堂祈福，尔后自己也前来提供帮助。”

约翰·布朗牧师温顺敦厚、乐善好施、体贴周到。对待求助者，他皆解囊相助。布朗牧师诚实正直，以礼待人，是三个儿子的道德榜样。工党之于戈登·布朗就如同教堂之于布朗牧师一样，这都是他们同贫困作战的武器。布朗深信，政府一定可以解决贫困问题；从道义上讲，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城市千疮百孔，满目萧瑟。油布厂倒闭了，550多名工人没了工作。煤矿也关闭了，成千上万的煤矿工人丢了饭碗。他很早就开始思考：政府在失业与贫困问题上应当有所作为。那时布朗还小，他哥哥却记得他的父亲当初多么希望工党能够赢得1959年的选举，为穷人做点事情。最终的结果却是保守党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当选首相，布朗的父亲对此大失所望。

布朗一直努力按照父母的期望行事，但有时表现也并非尽善尽美。一天，一个乞丐来到他家门。当时只有10岁的布朗打开自家大门，把乞丐带到厨房，让其饱餐了一顿。布朗父母回家时，看到此情此景大为不悦，因为这乞丐是镇上臭名昭著的窃贼。

布朗十分尊重父亲。整个童年，他一直很努力，希望赢得父亲的认可。在他整个人生过程中，父亲的认可始终弥足珍贵。1997年，时任财政大臣的布朗提交第一份财政预算方案时，受到了整个世界的一片赞誉，而最让他高兴的莫过于父亲在当地一家报纸上对他的评价。从字里行间里，我们可以读出这位年老牧师严谨慎重的口气：“我儿子的讲话富有智慧又不乏谦逊。我认为他不是在做秀，也不是在开玩笑。这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非常精彩的演讲！”

布朗的母亲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性。虽然母亲对他的影响没有父亲那样深远，但她依然深受布朗钦佩。二战时，布朗的母亲曾在伦敦负责情报解密工作，但她没有过多谈论这段往事。她娴静平和却又坚强勇敢，而且才智过人。



布朗从小就智力超群,4岁便能完整背诵“托马斯火车头”的故事,而且还时常向老师索要更难的作业。他提前一年小学毕业,然后升入柯科迪中学。这正是亚当·斯密早年的母校。二战后,这个学校的古老建筑再也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根据1944年教育法的要求,一所明亮通风的现代化校舍1958正式投入使用。不久,布朗便进入其中,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涯。

布朗的一位校友伊丽莎白·贝蒂·丁沃尔(现名为利兹·麦克维卡)说:“柯科迪中学是一所治学严谨的中学,它会成为布朗心中优秀教育的标准。学校办得很成功,吸纳了一大批工人阶级的子弟,使他们成为家族中能够进入大学深造的第一代幸运儿。”丁沃尔说,当时的中产阶级家庭很少,否则作为牧师儿子的布朗很可能在穿着和表现上与众不同。“医生、贵族等有钱人家的孩子都乘火车去爱丁堡上学。”

布朗与小学时代的一个童年挚交默里·埃尔德一起就读柯科迪中学。两人成为了终生的政治盟友与同僚。这两个聪明伶俐的男孩是当时教育实验改革的受益者。根据这项改革措施,在经过一项古老的智商测试之后,最聪明的学生可以直接升入文法学校。年仅10岁的布朗和埃尔德提前一年通过了考试,被双双安排进一个由11个男生和25个女生组成的尖子班,而学校的牧师竟然是他那严厉无比的父亲。

布朗对这样的教育并不觉得满意。1967年5月,他将内心的真实想法付诸笔端,写下了以下文字:

每年我眼睁睁看着我的一两个小伙伴因为不堪重压而倒下,我看到一个女生因为神经衰弱不得不暂时离开学校。我的一位朋友聪明过人,整整忍受了5年的压力,最后却仍然没有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只能绝望地离开学校。我只能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些年幼的“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可以有别样的命运。我们本可以避免这些

沉重的学习负担、失败的耻辱以及对失败的排斥心理。所有这一切,我看得比那些身处象牙塔中的教育者要清楚得多。

一个年仅 15 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精辟的分析,实在令人赞叹。这种经历也深深影响了布朗对教育的看法。时至今日,他仍然认为当初他们这批学生被逼迫得太厉害。尽管布朗本人态度非常谨慎,但他的朋友都异口同声地说,布朗反对至今仍然在英格兰部分地区实行的择优录取入学政策和小学毕业考试,而支持由威尔逊政府引入的就近入学、不分尖子班和普通班的普及型教育政策。这一普及型教育制度后来遭到了布莱尔政府的抵制。我们无法确切得知,成为首相后的布朗能否改革目前的教育政策,但那些支持回归普及型教育的人们已经在心中默念“等待布朗”达数年之久。

布朗是当年首批参加这项教育改革实验的学生。那一年的实验对象完全按照智商测试的结果进行挑选。第二年又增添了一些新的标准,其中一位被选中的女孩就是伊丽莎白·丁尔沃。如今她是一位教育心理学家,回想过去那段经历,她说,这项改革实验使接受测试者成为学校中的“异类”。她认为,这足以让布朗相信,让 11 岁的孩子参加选拔考试的确害人至深。丁尔沃说:“如果让年少的孩子整年都在琢磨怎样才能使自己变得更聪明,这的确会让他们不堪重负。”

布朗在 14 岁的时候,也就是比正常时间早两年就达到 O 级。15 岁时,他得到了五个 A,达到了相当于苏格兰地区的 A 级水平。这一非凡的成绩使得他从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最聪慧的学生之一。他取得如此好的成绩,却并没有变成书呆子。体育老师说他是“超级全能运动员”。布朗擅长跑步,喜欢足球和橄榄球运动。他不只是一位刻苦锻炼的大块头运动员,还是文艺社团与辩论社的明星。布朗在学校的管弦乐队中担当小提琴手,还参与学校杂志的编辑工作。他还是社交能手,机智诙谐,深得女生好感。而此时的他只有 15 岁!